

民國貴州文獻大系

第一輯 上冊

● 苗族調查報告

〔日〕鳥居龍藏 著

唐末程元龍平定溪洞，世守程番。至宋
興，累傳至民新，於國朝順治十五年，准
自唐末方定遠開疆。歷宋、元至明，於洪武
前職。維新傳子鳴玉，鳴玉傳子鼎。鼎子
始自唐末程鸞。歷宋、元至明，於洪武
登雲傳子起鵬，起鵬傳弟一鵬。一鵬子
始自唐末盧君聘。歷宋、元至明，於洪武
用傳子俊，俊子廷珍。康熙四十五年，
始自唐末方德恆，以征勦九蠻功，授官
世襲。累傳至正綱，於國朝順治十五年

貴州人民出版社

民国贵州文献大系

第一輯 (上册)

总序
会员委员会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整理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龙志毅

顾 问 蒋南华 范同寿

主 任 委 员 顾 久

副主任委员 王德玉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常务)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民雄 王羊勺 王尧礼 何 萍

张伟云 张祥光 张新民 李立朴

李华年 李黔宾 陈 琳 翁家烈

黄万机 程亦赤 谭佛佑

编辑部

主 任 王羊勺

副 主 任 王尧礼 陈 琳

编 辑 胡海琴 郎启飞

总序

顾久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为“文，典籍也；献，贤也”。就是说文指典籍文章，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宋元之际的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以为“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他将文献的外延缩小了，只限于一般的文字记载，不能表达为文字记载的东西，则不能称之为文献。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泛指古籍外，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碑文、绘画等，统称为“历史文献”。一九八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的“文献”，就是这个变化、扩大了的概念。

我国向称文献之邦，历代所积，浩如烟海，民国文献，又数倍于古代。原因是中华民国虽然短暂，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短短三十八年间发生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军阀混战，外敌侵略，国共两党空前大内战及政权易手等重大事件，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多故，学术文化的繁荣，新闻出版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使这

个时期的文献数量剧增,种类繁多,涵盖图书、期刊、报纸、手稿、书札,还包括海报、老照片、电影、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文稿、日记、传单、商业契约和票据等。据初步估算,国内民国时期文献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数量最多、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献,本应得到整理利用,但恰恰相反,全国各省甚至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大抵都是一笔糊涂账。而且民国时期正处于由手工造纸向机械造纸转化的初级时期,造纸材料混杂,制浆工艺落后,多为机械磨木浆纸和酸性化学浆纸,导致纸张酸性强,质量差,保存期短,经过百十年后,大多早已黄脆不可触摸。所以,抢救、整理出版民国文献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二〇一〇年省文史馆向省政府建议编纂“民国贵州文献大系”,得到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批准了,并拨出了专项经费。为此,省文史馆组成了编委会和编辑部,邀请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座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拟出了一个粗目,依靠馆内外的力量,搜集、整理、编纂。

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决定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又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东南诸省从自然风光来说,并不一定优于贵州,但游人趋之若鹜,主要还是那里的人文积淀深厚。文化的吸引力、向心力、凝聚力就显示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地方。胡锦涛同志曾说:“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就为我们指出了具体的工作方向。我们贵州本来文化积淀不如东南各省深厚,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贵州文化自有其独特之处。贵州人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这说明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深厚的潜力,只是整理、发掘不够,不及时,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一致,影响了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整理出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的文献起讫时间主要为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写作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内容重要的著述,也酌量收入。

二、本丛书所收文献,以已出版的图书、期刊及未刊稿为主,以书刊报纸辑录为辅。

三、本丛书力图反映贵州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风俗、物产等方面的内容,收录的是贵州人的著作及省外人士关于贵州的著作,主要涉及文、史、哲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文献,包括契约、票证、摄影、绘画等作品。

四、本丛书以标准规范简体字及现代通用标点进行整理,横式排印;书中明显的错别字径改,一般不出校,也不加注。不可少的说明、校、注置于本页脚。原文不能辨识的,用□代替。

五、书中的数字及个别特殊的字词(如的、地、得等)因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故保留原来的用法,不作改动。数字用法,一依原著,而不改作阿拉伯数字。

六、本丛书分辑出版,每辑分为上、下两册,每辑二十至六十万字;字数较少的著作,合几种为一辑。每辑的内容不一定类同。

七、每辑的上册冠以总序、出版说明;每一种著作前冠以一篇整理前言(个别著作情况特殊,可不称“整理前言”),介绍本书的内容、价值及其作者,整理情况等。

八、本丛书对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谓的字眼如“狎”、

“猺”等,随文改为“仲”、“瑶”,有的改后反生歧义,可保留原貌,但一书必须统一,不可出现不同的写法。另有部分字句对一些历史事件,对少数民族的记述、评价也不客观、不全面,甚至是歪曲,删改恐影响文献的原貌,故亦仍其旧,请读者注意辨别。

苗族調查報告

烏居龍藏 著
國立編譯館 譯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凡 例

(补遗 校注)

一、本书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东京帝国大学于“明治四十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编纂发行、株式会社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印刷的“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室 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为底本,即“原版本”,该本以日文片假名竖排印行;以贵州省图书馆收藏的国立编译馆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四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署名:“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 鸟居龙藏著、国立编译馆译《苗族调查报告》”为补遗校注本,以王尧礼先生收藏的上述同书(版权页已佚)和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原编、南天书局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亚洲民族考古丛刊 第二辑(16)·〈苗族调查报告〉上册 鸟居龙藏著 国立编译馆译》、《亚洲民族考古丛刊 第二辑(17)·〈苗族调查报告〉下册 鸟居龙藏著 国立编译馆译》影印本为补遗校注参考本,为有所区别,而将前者称“原译本A”,后两者分称“原译本B”和“原译本C”,三者皆为竖排印行;以日本朝日新闻社于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鸟居龙藏全集》第十一卷收录的《苗族调查报告》(明治四十年七月刊本)为底本参考本,即“朝日本”,该本仍以日文片假名竖排印行,入集时中国文献部分经九州大学教授冈崎敬校订并用平假名译排;以贵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国立编译馆译“[日]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的版本为原译本的参考本,即“贵大本”,该本出版时

已有局部编辑并采用横排印行。

“原版本”、“原译本 A”、“原译本 B”和“贵大本”均为一册本,首尾两本各为十六开本、中间两本均为大三十二开本;“原译本 C”为上、下两册三十二开本。“朝日本”为《鸟居龙藏全集》第十一卷中的主要部分,与鸟居龙藏的《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人类学写真集——台湾红头屿之部》两本专著和四十八篇“杂志论文”合成一卷,为三十二开本。

二、本书附录一节译的鸟居龙藏著《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由日本富山房于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刊行(大三十二开本),日本朝日新闻社于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将该书和《南满洲调查报告》、《从西伯利亚到满蒙》两书及其十八篇“杂志论文”,收录《鸟居龙藏全集》第十卷出版,均为日文平假名三十二开竖排本。本书的节译内容是以后者为底本仍称朝日本,以富山房原版本和大林太良改编的鸟居龙藏著《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日本《朝日选书》一百六十二集,朝日新闻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为参考本,前者仍称原版本,后者称选书本。

三、“原译本”和附录一引用文字中对少数民族有污辱的民族名称、地名等字样均加引号保留原字,如“猓”、“八番”等。

四、注释中以汉字表示的时间为中国夏历纪年记时或日本纪年记时,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时间为公元纪年记时。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依据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和日本《国语大辞典》(尚学图书编集,昭和五十七年版)所附《西历·和历对照表》。

五、“原译本”的书名左旁采用竖波浪标识,现改为书名号;“原译本”的人名、地名左旁采用竖直线标识,现改为横排印行而取消标识;注释中的县、乡、镇名均指一九九二年建镇、并乡、撤区前的区划建置名称。

六、“原译本”和附录一中的部分古体字、通假字仍按旧字,竖排本中以“右”提示上文,以“左”提示下文,横排本中皆改为“上”或“下”。

七、本书补遗校注中,有关我国古籍,参照“朝日本”,尽可能以原著版本校对;有关欧美图书的作者名、国籍与书名皆译为中文,并以〔〕区别。凡补译、节译中〔〕内的文字亦为补注说明。

八、“原译本”中的少数罗马字有脱落或字迹不清者,均按“原版本”和“朝日本”校补。

九、“原译本”采用当时的通俗“文言文”表述,今补译“原版本”中的“凡例”、“第一章旅行顺序及日程”和附录一的鸟居龙藏著《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的节译章节,均采用现代口语表述。

十、“原译本”对“原版本”征引中外图书的讹误脱略之处,已有部分查核修正,现经校对仍有一些存疑之处。因笔者外语水平有限,有关补充翻译内容同样疏误难免,敬盼读者指教。

十一、本书补遗图片为四类,第一类是鸟居博士显彰会提供并授权,第二类是鸟居龙藏在贵州旅途中拍摄的而未纳入“原版本”,由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馆提供并授权;第三类是鸟居龙藏在贵州旅途中采集的实物,经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展出,由该馆塚田诚之教授拍摄提供并授权。第四类是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绘画图件等,他与鸟居龙藏同校,晚半年游学经过贵州,走同一条路线,收集的资料正好是对鸟居调查的补充。

十二、本书的附录二、附录三分别是对《苗族调查报告》和《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两本书的书评,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鸟居龙藏的著述和业绩,并对原文有相应的补注。

前 言

(补遗 校注)

—

鸟居龙藏博士(一八七〇—一九五三)是国际著名的日本学者,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和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他在长达六十七年的学问生涯中,共写了三十七部日文、英文专著和五百四十九篇日文、法文、英文的各类文章,收入全集共有十二卷计千万言,兼容了当今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内容。此外,还拍摄了二千八百四十五张玻璃底片的老照片,成为跨越近、现代国际学者中拍摄照片最多的一人。从一八九五年开始,鸟居一直在中国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全部著作和照片各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中国学问的内容,筚路蓝缕,实具开创之功。他晚年定居北京,在同中国人民的长期接触中,对中国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贡献。虽然处于“探险和殖民主义表里一体”的时代,可是他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从一个毫无学历可言的地方少年,最后成为一个纵横东亚学界的“巨人”。在这过程中,他敢于拒绝迎合任何主流的制度、权势与学术潮流,而成就自己的学问。特别在取得国际功名之后,竟然不屈权势而“下野”,成为在野的民间学者,培养了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青年学者。

时为“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室由雇员转为研究人员、三十二岁的鸟居龙藏,告别了婚后半年的妻子,离开日本东京,于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日从横滨乘博爱丸号,经神户、门司、长崎,八月六日抵达上海,然后溯长江、沅江而上,于同年十月五日由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进入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踏上了湘黔滇驿道,开始了历时四十天的贵州民族文化考察。

在“探险和殖民主义构成了表里一体”的时代,鸟居龙藏从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得知,台湾高山族和西南地区的苗族同属“印度支那民族”;他想通过实地调查加以验证,同时还想调查苗族周边的其他民族,特别是彝族。尽管鸟居在贵州的调查时间只有四十天,然而他对贵州民族乃至西南民族的研究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学问生涯。可以说,鸟居从自学完中学课程而进入学界的第九个年头就开始研究贵州民族文化,到他学问生涯第六十七个年头的逝世,在他的整个学问生涯中有五十八年都在关心着中国西南民族文化特别是贵州民族文化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鸟居龙藏写的关于中国西南民族的专著和论文多达三十余数。在其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既有专著,又有论文、译文,书评,还有通讯等;在学科内容方面,既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又有考古学,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了。还有,他在贵州旅行时拍摄的照片有很多,据多方面的整理、收集和出版,保留至今的有一百零八幅。其中,在《苗族调查报告》中有八十九幅,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收藏有十九幅。另有十四幅图片,是反映鸟居在贵州采集而带到日本的现存民族文物,一并汇集于本书。

鸟居龙藏的亚洲研究即“鸟居学”,据日本学者的分析划分为“初熟”、“成熟”和“圆熟”三个时期。在他著述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九

〇七)、《日本周围民族的原始宗教》(一九二四)、《有史以前的日本》(一九二五)、《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一九二六)与贵州民族文化相关联的四本专著中,前两本是在“鸟居学”的“成熟期”中出版的,实际上是跨越两个时期的作品;另外两本是在“圆熟期”中出版的,实际内容已是贯穿三个时期的作品。鸟居龙藏的贵州学问,在整个“鸟居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

《苗族调查报告》一书是鸟居龙藏到中国西南调查后写的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对长江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的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还是他一生中写的三十六部日文著作中的第六部即“成熟期”中的第一部。原版共有十章,除插图外还刊载了九十幅玻璃底片的影像图版即老照片,包括对苗族各支系的“青苗”、“白苗”、“花苗”、“黑苗”、“打铁苗”和“狛家苗”(今布依族)的服饰、纺织、用具、乐器及住房等方面的直接反映。一九三六年,上海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翻译出版时删去了原版中的凡例和第一章,仅存九章,而且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有所编译。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学界影响较大。一九三七年,贵州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撰写的《苗族述略》,对鸟居龙藏关于苗族的学问立即作出了反响,认为他对苗族的调查研究“比较有价值”。同年,江应梁先生(后任云南大学教授)在《现代史学》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文,认为“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虽其中缺漏的部分很多,但其可贵之处,则在显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的第七章至第九章“其见地确很高。三章中研究方式最完善者为铜鼓,研究方法最谨严者为笙,研究结论最精彩者为花纹”(见本书附录二)。一九四四年,岑家梧先生在《贵州民族研究述略》一文,为

“黔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指出:“黔省民族正式作人类学上之调查者当推日人鸟居龙藏。”一九四五年,任可澄总纂的民国《贵州通志》曾多处引用过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

四

一九八〇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朝日选书》,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大林太良教授将鸟居龙藏的旅行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改编为《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并写了《解说》。他说:“鸟居去调查旅行是在二十世纪初头。从那时到现在(一九八〇年),大概有将近八十年的时间。如果是在当时出生的人,那已是经历喜寿的漫长岁月。这期间,在中国,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南部,正是巨大变化的时代。……今年(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参加以筑波大学直江广治教授为团长的日本民俗学友好访中团,访问了中国西南部的几个少数民族。我的访问和鸟居的调查地点有所不同,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哈尼族、基诺族,只有云南省会昆明(以前的云南府)和鸟居旅行时的停留地相重。而且,我的旅行是乘坐飞机,住在都市的饭店;相当偏僻的地方都铺有沥青公路,随时都可坐中巴车去。霍西和鸟居亲身经历的旅行劳苦,根据时至今日的实感,可想象当时的困难。还有去偏远的少数民族村落也好,到处可见到人民公社组织,电气设施,小学校。鸟居等初期的调查,他们的生活正处于困难之中;因此,可以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较好保留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体现的时代风貌。现在能够保留下当时的记录,无不感到它的重要性。”(见本书附录三)

五

一九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九三年四月,笔者应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